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

红罂粟海外卷

今天情人节

〔法〕刘西鸿 著



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

今天情人节

〔法〕刘西鸿 著

金钟鸣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苦苦咧甜甜咧，甜甜廿四味·····	(1)
苦苦咧甜甜咧，甜甜廿四味·····	(30)
自己的天空·····	(37)
我与你同行·····	(70)
黑森林·····	(90)
爱人啊，在路上到处都有·····	(117)
我告诉你，你要不要听？·····	(154)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为什么这样红？·····	(162)
换上便服的海关小姐·····	(171)
今天情人节·····	(179)
我十四岁·····	(194)
九九金·····	(225)
罌粟花的命·····	(250)
我为什么写作及其他·····	(257)
致我亲爱的少男少女·····	(261)
艳星梦露·····	(266)
巧遇·····	(268)

目 录

街景.....	(270)
我看亦舒小说.....	(272)
我所知所爱的三毛.....	(275)
看罢《犀牛》想到的.....	(279)
馋在天涯.....	(281)
巴黎琐记.....	(292)
在 PHLOX 家作客.....	(299)
菲鲁.....	(305)

苦苦咧，甘甘咧，甜甜廿四味

学问与夫人

我初时进学校受教育，是父母的意愿；考大学时报理科不报文科，是老师的主意；当我什么也考不上，来到社会，在闲时挑拣些自己喜欢的小书来看，就完完全全是自作的主张。自己拣出来读的书，不用人逼着、指点着：“抄下来”，“背熟它”，也能记得很牢。

很多年了，我还能记起哪本小说里有一段：河边，天天围着一群洗衣妇。她们屈身洗着大篮大篮的衬衣裤子之类，谈着各种各样的故事。最健谈的一个洗衣妇叫塔里亚·科士罗夫斯卡娅。她是同伴中特别出色的一个，谁有什么事都找她商量。仅因为，仅因为她有一个女儿在中学里念书，为了这个她特别受人尊敬。每当她背着两篮湿衣服从滑溜的小路走下来时，别人碰见她，总是笑嘻嘻地、很关心地问：

“你小姐好么？”

“还好，谢谢你。托上帝的福，在念书。”

“瞧着吧，将来会当夫人的。”

“叫她念书，就想她能当夫人。什么贵族，什么夫人太太，

你说从哪儿来的？统统是咱们这班土百姓出身的呀。学问学得强，手臂长得长；手臂长得长，东西捞得多，做出事来人家都要对你笑呵呵……”

洗衣妇那流畅和自信的谈话，永远给我清晰的记忆。

我充满感情地、添油加醋地给女伴们叙述这一段时，她们付给我呵呵一笑，然后说：

“从哪儿听来的？你读的是什么书啊！”

“还是个东欧人的名字呢，瞧你记性多好！”

说完就算过去了，不再谈论下去。如果说这种态度只使我扫兴，那么长脚的态度就使我难过了。

长脚是我们房内的唯一的本科毕业生。刚来时，一天到晚抖着她的小红本，让人看看她是个学士。“学士有什么呢！”她第一百次掏出小红本炫耀时，我心里就这样想，“如果，我读完本科，我还能拿硕士哩。”

长脚听完我说的故事，啪地从床上跳下来往门外走，夹着一本厚厚的书，眼睛是很蔑视我和我的故事的样子。她的脸很白，双眼往耳朵方向有点儿吊，读的又是精装的，山羊皮面烫金字的书。以后的夫人太太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洗衣妇中的一个，又粗野，又多嘴，又好俏，常做着用烫热的火钳卷额发一类格调低下的事，对世间微小的事物都抱有可怜的兴趣，理所当然遭到长脚之流的讥笑。因对，或因人眼“你嘲弄了学问。”待她返来时，这样平心静气地对我说。我不承认是嘲弄学问，也没有认为夫人太太本身有什么不好。长脚给我造成的难过已经过去，同时我也失去了解释的信心。我对她笑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不过我心中认准，洗衣妇的话真正含蓄着一种真理。这种真理就是：“学问学得强，手臂长得长；手臂长得长，东西捞得

多。”她分到我们宿舍的当天，指着书桌朝窗的那片地方说：“那是谁的？我要朝窗的一边，谁跟我换换吧。”我用眼光制止小南，但小南已经开声答应她了。小南比长脚小三岁，倒过来让着她。我觉得长脚太霸道。她铺开草席，坐上床盘起腿，笑盈盈地望着我们，电影明星式的捧着心：“我没有男朋友，但我不反对你们交男朋友，甚至带到这屋子里来。不过，不要在这里呆得太晚……”我长吁出憋着的一口气，到底是大学出来的。看出小南对长脚有好感，我只好对长脚造作出来的坦诚，囫囵吞下了。邹一星期来过我屋子三次，第一次是叫听电话，第二次是还网袋，第三次是聊天。我送走客人洗干净茶杯回到屋里，长脚低着头，眼睛盯在翻开的书本上，说：“喂，邹是有妇之夫啊。”她轻轻地笑，脸儿映得红红的。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她脸上能组合这种复杂的表情。她把这话说第二遍时，连自己也按捺不住话里头的些许恶毒成分。我慢慢踱到她床边，说：“唔，是的，我知道了。”她确信我承认了由于她的提醒才避免了一场火灾，才作罢。我和长脚不会当面吵架。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长脚睡下了又爬起床，撩开我的蚊帐要和我聊天。我让她进来。我们聊了半个小时，她才爬回自己的床上去。半小时里，全由她讲她对一个男影星的印象以及对他演的电影的感受。“×××，真有股动人心弦的力量。”长脚喃喃低语，“××……”“××……”，后来，她干脆去掉姓氏，亲热地呼唤起这个不相识的男人的名字来。如果不是她有着特殊的坦诚，我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长脚这种浅薄的一往情深的。小时候在我上学途经的街道上，常看见一些电线杆上钉着一只

小木箱，箱子是给街道居民放死老鼠的。我努力把长脚和男影星的形象缠在一起，但思维一下就滑到“电线杆挂老鼠箱”上去了。“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”长脚问我。我想了想，且不说这位影星的演技如何一般，台风怎样轻佻，单说“电线杆挂老鼠箱”就会伤透长脚的心。于是我没有说。

我敢于纠正长脚的，是她和我谈话时凡是涉及单位领导、单位事务，她总是这样称呼：“你们的经理……”“你们公司那天……”“喂，”我立即打住她的话，“你们你们，好象你就不属这个公司似的，经理不也是你的经理么？你也太显贵了。”长脚经常给我讲起她大学读书时的一个女同学。每次谈及不愉快的事时，就涉及这个女学生，一涉及到她，长脚便露出不满意的无可奈何的神态。我说：“你讲的就是她啊，经常在报上见到她的文章哩。”“但她脾气很坏。看她的文章，你是不知道她的品性的，她就靠文章粉饰自己！”长脚打断我的话找出相簿翻开，指着一张集体照给我看：“你看，就是她。”如果一个很熟悉的人滔滔不绝给我讲一个不熟悉的人坏话，我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，还会带着轻微厌恶的心理去理解那个不熟悉的人，以往我都这样。但这次我例外，我盯着照片上那个并不年轻但面容姣好的女子，一点也不厌。过了不久的一天，我下班回宿舍递给长脚一份晚报：“你同学的小说获奖了。”长脚躺在床上接过报纸，把身转向墙壁，好象早就知道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，缓缓地答：“那又怎么样，她不就写了死么，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这个世界，没有什么能比死亡有着更大的力量了。”她翻身坐起，“你不要把这些看得太重，得了什么奖，并不代表取得最高成就。况且……”她只迟疑了一下就说出了，“什么事情，都有着我们所知道的背景。”

我坐在床上，觉得长脚的话是对的。她有时爱把问题复杂

化，尽往坏里想。这归功于她的学问，她读的书多。

可我亲眼看见长脚作的一次弊。办公室放着一堆堆分好的橙子，每人一份。长脚反锁上门，在十几堆橙子中每堆拣两只，放进小白布包里。这是我无意中看见的一个令人耳热的场面。回到宿舍，长脚每天光明正大地从白布袋掏出一二只橙子吃。我故意问她：“你怎么就比我们多呢？”“另外买的呗！”长脚朗朗地答。我把这事对小南和盘托出，她不相信地打量我：“不会吧，长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……”我不再言语了，很后悔这样简单地跟小南讲了叫她无法相信的事。不过我印证了那条名言至理学：“学问学得强，手臂长得长；手臂长得长，东西捞得多……”

我们扰扰攘攘地共同过了几年，长脚在她二十九岁的时候远嫁圣弗兰西斯科了。她最终也没有给我和小南讲清她为什么要远渡重洋去嫁人，怎么办的手续？令她愿以身相许的是个什么样的男子？我想可能是由于某种学问太深的缘故，把这一片的心，这一片的情愫封死了，不禁有点悲哀：我终究没有能力让长脚讲真话，掏真心。“她哭了吗？”长脚乘坐的车远去时，我鼻子发酸，就这样问小南。“没有，好象没有。”小南说，“不过她是撑着我的肩膀上车的，象一点力气也没有一样。”小南揉揉自己的肩膀。我看看周围的人，许多是长脚的从未露过面的亲戚。长脚憔悴地走了，他们却喜孜孜的，象是送一辆去挖金山的空车，他们跺着脚坚信：空车回程时，定载着黄灿灿的满车金子。

想起长脚的时候，我隐约觉得自己有错。错在哪里无法逐项排出，总之因为长脚，我有错；因为我的错，长脚才远走了。长脚这下是去当有学问的夫人，在夫人们当中她是最低等的一个。这样一想，我的悲哀又加了一份。

长脚走了以后，我才想起关于洗衣妇的故事，是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里的。

只两秒钟，屋中人个个一怔。干

科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告诉我：“要调你了，到那边扛大旗。给你五个人。”他一样一样铺了一桌面理由：为什么要调你？你是老同志了，这是个重任啊！你是可以干的，大家都在瞧着你……然后温柔、慈爱地问：“你有什么意见呢？”我说：“报到上面了吗？”“报了，已经批了下来。喏，”他拉开抽屉翻着，我站起身：“批了还征求什么意见呢？不想干也得干了。”

上午我就去看场地，打扫了新办公室。屋子只有十平方米左右，挤五张办公桌。然后我带上一个孩儿般的男同事到仓库领热水瓶、钉书机之类。

一管理员患消化不良，嘴巴喷着又馊又热的气，不满地说：“你们科昨天才领了，今天又来？！”我解释了一番：是新班子领的，那边连一张纸屑也没有。看着他不情愿地将领物单上列的东西逐件掷进我的小纸箱时，我心里很委屈，刹那间象变成个后娘养的孩子。

在离科长办公室很远的我们的小办公室，六个人围着坐。我给他们每人一份复印的文件，然后对自己说：看你的啦。

他们全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，如果在学校，还得象个孩子一样让人教育，让人修正。整整一天，我不停地讲着许多坚定信心的话，对大家，也对自己。六个人似乎都激动了，我看到一张张大受鼓舞的脸。屋子里有一种战场上的架势，我是那个叫着“弟兄们！冲啊——”的角色。讲完话，我却象泄了气的皮球，实际上我自己也很茫然，我从未带过一个班子，以往

都是别人带我的。

我托起腮，透过窗子往外望。远处是小学校的操场，有一队人马在拔河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赛完了一局又一局。中间的红旗一挥，“哗”的一声整队人马就往左边倒了，旗子再一挥，“哗”的一声整队又往右边倒了。我在小屋子里为他们着急，哪有这样的比赛呢？两队人马都是黑簇簇的，象两条同年龄的粗大的蜈蚣，力量并不是悬殊啊。肯定是其中一方未准备好就开始了。拔河嘛，是比恒力，速战速决的仗有什么意思呢？比捏死臭虫还要轻而易举地胜了弱的对手，算不得将军。恒力、耐心、持久、刚强、坚韧不拔、还有大无畏，才是英雄本色。

我收回目光。心、力、大无畏。这下看我的了。薄薄的两页文件，硬要这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定坐着看四个钟头，他们开始不耐烦了，陆续放下手中的纸，对着脸就胡扯开来：

“昨晚我拉稀了。”一个说。“什么吃的？饭堂午餐的菜里有苍蝇？”另一个问。“菜里有苍蝇是老历史了。饭堂越来越离谱，过去都是成只的，现在是手脚眼耳口鼻分开来，叫你分拣不得。想必是厨师炒成这样的。”见我没制止，第三个就搭上嘴。

“铁合金，”一个举起手中的文件纸，说：“指什么铁合金？是不是包括所有铁合金？范围不明确……”我拿起本子记下，这点要向科长反映的：“铁合金”列名不明确。

于是，他们就从铁合金讲到摩托车上的一只零件，从这只零件讲到进口车的种类，铃木、川崎、雅马哈，讲到雅马哈撞死人，讲到摩托车不安全，开汽车是铁包人，开摩托车是人包铁。

“我还没见过死人哩。”“我见过了。我还见过被火药炸死的人。烟花厂经常爆炸的，被炸死的人手指碎得一粒一粒，肠子

挂到屋外的电线杆上。”几个人同时发出嘻嘻的笑，好象不相信，好象很好玩。“是烟花厂的人抽烟着火吗？”“不是。是搞卫生的人进火药库不换软鞋，不先在地面洒水就干扫起来——你不知道，空气中全是火药粒啊，一摩擦就炸开了。很惨。”“不是要有雷管才爆的么？”我定定神，细心听，是啊，不是说要有雷管才能引爆的么。“不一定。摩擦，热，就能爆了。你们没见飞机投炸弹？哪儿有雷管什么的，一味地投，掉到地下撞击就能引爆了。”

他们讲死人讲了很长时间。其中一个女同事还战战兢兢地说她见过一具溺死的女尸，全身发绿。

我的胃胀起来，很难受，推门走出了屋子。迎面见到科长过来。“在学习吗？”科长问。“在学习。”我答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还讨论了。”他便立住步，嘱咐了几件业务上的事，没有进屋就走了。我茫然地目送科长蹬上自行车，想：难道他没看出我的沮丧吗？

我回到屋子，他们还在兴高采烈地谈，轻松又愉快的气氛。已经转谈另一件事了：楼下101室的壁柜每年都养出一窝老鼠，是在棉被卷里养的。“那是集体宿舍啊，”我惊奇地问：“谁的棉胎养出来的呢？”其中一个人边答话边拉过椅子让我坐。靠墙坐着的一个人凑近我，低声问：“你不喜欢听这些吗？你好象不喜欢——其实干活嘛，气氛轻松点好，能干出活来就行了。”他脸上还带着稚气，讲出话来又这样老成。我坐下，心里熨贴了些。今后干活就是靠这里的大伙儿了。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，“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瓦西里的话。我这里也是，会有的，大伙儿的热情，大伙儿的干劲，一切都会有的。长脸儿小伙早上抢着打开水，蓝衬衫的姑娘叠起两张椅子爬上去擦窗玻璃，还有那一个，一眼就看出商品目录中列名不具体

的地方。今后他们还能教会我许多事。不过讲起炸弹，我还是认为飞机投的炸弹一定是有雷管的。

梦

白天得到了炸弹的知识，晚上就做了炸弹的梦。梦见飞机投炸弹，我在地上跑。

空袭已经好几天了，每天都炸死很多人，翻起很多新鲜的泥土。土一堆堆地隆起，半掩着炸死的人。炸死的人脑袋被新鲜的、松松的土盖着，侧着身子。男人们都屈着腿，弓着腰；女人们都散着发，衣服的下摆撩起一只角。露出凹凹的肚脐眼和微黑的、隆起的小腹。远看死人们全都象干活累了一样，躺在山坡上晒太阳。

飞机来之前，我满山遍野地跑，寻找一个颜色跟我的衣服近似的、最好是凹下去的腹坡。我只身一人，只要贴着地面一躺，免死还是有可能的。可是，有一个人老跟着我。是个女人。（女孩？）她穿着一件红得耀眼的衣服，祈求我带她一同逃命。我很为难，她的衣服太碍眼了，炸弹炸不着，飞机上的机关枪也能瞄准把她射死。我很为难，她跟着我，她死也会连累死我的。

响起警报声，飞机要来了！

我带着她满山遍野地，无目的地跑。

到处都是人，也在寻找安全的地方。有的人就地一扑，噗的卧倒，象玩着一个狗抢屎的游戏；有的人唉的一声长叹，望着天空咒了一句，才躺下，嘴里继续不停地咒骂。他们都没有恐惧，也没有哀伤，只是很不耐烦，好象天上的飞机是一群无聊的顽皮的孩童，被这样的孩童缠着了就脱不得身，干不得正经活儿一样。

到处都是人。

我拉着小红点，边跑边给她讲道理：不要老缠着我，分散跑开，大家都挨不着炸，成群结伴的，大家都得死掉。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不知听进去了没有。她的手扯紧我的衣角，象钉子打的一样实，使我觉得我要死了，给她害死的。

好容易找到一个我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。背阳的坡，松松的翻起的土，已经有几个人散散地侧身躺着了。

“就这里吧，”我对小红点说：“你到那边去，”我指指不远处的一堆红褐色的土，那里也躺着一个人，“我在这儿躲。”我又指指附近一堆近似我衣服颜色的土，这儿也有一个人躺着。我们都有伴儿啦。

小红点听话地向红褐色的土走去。我靠着那个躺倒的人身边侧卧下来。

是个女人。穿着颜色陈旧的衣，脏，又粗糙。她的左手臂被松土掩着，脑袋呢？哟！是个死人。

我倏然弹起，细细地看：她真是个死人。

女人的胸口平静地、安宁地朝着天空。她早就没了呼吸。

我举目四望：都是死人啊！

可是没有一滴血。

小红点已经心安理得地躺下了。我跑过去告诉她都是死人。她靠着的是一个男人，生前象是干苦力的。脚后跟积着开裂的污垢。

她说：“死人怕什么。飞机往下一看，都是死人了就不用浪费炸弹再炸了呀！”

“我们都冒充死人吧。”她对我说：“来，帮我把脑袋盖起来。用这堆土。”她指指红褐色的土。

冒充死人。我觉得这办法可以。于是就听她的话了。

.....

丁去查站前山自回

醒来时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什么我一直想不起叫小红点脱掉红衣服呢？竟然要冒充死人！

我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，是半夜，差五分一点。拧亮台灯，人变得格外清醒。我再也睡不着了，只好拥被而坐，托着腮帮想阿七。

我们是在朋友家认识的。那天晚上来了好多人，凳子未坐热就突然断电了。阿七是在刚燃着烛光时进来的。整个晚上，他的影子印在墙上，比真人大好几倍，牙尖嘴利地谈了许多人道主义，人性，人的特质等等，又外延又内涵地解释了一番，令我好一阵新奇。后来他坐到我身边的一张单人沙发上，侧着身子对我，“这里你最小？看来。”我看了看周围，“可能是。”“爱看书吗？都看些什么书？”我思忖着未答。阿七又说：“你背脊有块白灰，要我帮你掸掸么？”我扭头看，他说：“看不到的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我来吧。”随手在朋友的书架下抽出一只“不求人”，噔噔地敲打我的脊梁骨，“男女授受不亲，”他自言自语，噔噔，然后在我眼前扬了下“不求人”，“放心，塑料的，绝缘。你看谁的书多？托尔斯泰？巴尔扎克？莎士比亚？”“看过莎士比亚的。”“是吗？哦，真好。《雅典的泰门》，《麦克佩斯》，《哈姆雷特》。《哈姆雷特》——连对话都是美的，能当诗来念。”“是啊，”我说，“管家有句话：不要借别人的钱，也不要借钱给别人……”“哟！”阿七停止敲打，说：“你记得这些呀？”是啊，我怎么记得这些呢？我很沮丧。读了莎翁的戏剧，没能沾上点贵族味儿，反脱口而出这些恶俗的话。阿七扔下“不求人”，踱

回自己的位置去了。

尽管这样，散场的时候他却小巷口窄窄的过道等着。现在我想，那天他准是在等我。他问我：“你贵姓？以后还来这里玩么？”我告诉了他，反问：“你呢？”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从衣袋拔出支笔，“我没有纸。你有纸吗？我写个电话号码给你。”我找遍全身，给了他一迭叠着的粉红色手纸，“请不要介意，用这个吧。”“我不介意。”他绝无介意地接过硬纸转过身，把双肘架在墙上，侧起脑瓜贴墙写起来。很快就把笔和纸递给我，“到你了。写轻点，别划破纸。”我学着他的样子，架着肘子贴着墙在手纸上写了公司名称、电话号码和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揭下一页给他，我留下他的那页。我们逆着风，在黑暗中小心折着权当名片的手纸。粉红色的名片被晚风轻拂，象一面绸帛一样软绵绵。阿七很快就折好了，提着双肩把纸团掖到牛仔裤兜里，伸手和我道再见。

以后阿七就常来找我，他不来时，我就去找他。我们总是文雅有礼地先给对方一个电话，“有空吗？”“七点半钟。”“可以。”“一定。”他把自己借书证的相片撕下，不定时借给我书证：“没关系的，他们不查。”我呢，常常义务为他抄些稿子。阿七有点犟儿头。他是西班牙语专业出身的，常说过去以为学着稀有语种很得意，现在用不上，郁郁不得志。近来，他不知从哪里搞来许多没头没尾书页发黄的资料，夜以继日地译着一篇接一篇豆腐块的短文。我不厌其烦地替他誊抄，觉得又可恨又可笑：他挑拣着译的全是耸人听闻的东西。“大刊物是无法打得入的。给小报，我全给小报，他们态度好。”阿七又感动又心满意足地重复叹着，“他们态度好。”他投的稿子统统中的，并且多数同时中几家报纸。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规劝他不要违反投稿纪律，不要一稿几投，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解释：“没人知道的。知道了

也会用。他们态度好，他们态度好。”

每每这时，我就停止规劝，由他去了。因为试过一次，我继续说教：“这是意识问题。”他认认真真地看了我一会儿，嘴角一扯：“你说的只是意识，不涉及道德吧？”“一样的，好是好，坏是坏，时时有事事都应有个客观标准。”“但是意识形态不同，意识形态没有，意识形态嘛……”“如果由于意识问题而引起灵性的堕落糜烂，以及人类的某些变态行为，怎么解释？”他搔着堆着稻草一样长头发的脑袋，迟疑着，好象费很大的劲在琢磨，之后，不大流利地反问我，并且眼睛溢满了疑惑，“请你先跟我解释，什么是……灵性的堕落糜烂？什么，是人类的，变态行为？然后，我，再回答你，意识问题是否会引起灵性的堕落糜烂以及人类的某些变态行为。”他长我七岁，如此野蛮如此缺乏现实感，令我很扫兴，甚至愤怒。“我说，……”，他啪的一巴掌打在自己的后脑勺上，“大蚊子，猖狂！隔着头发来蜇我！哟，刚刚我讲错话，报应了，报应。”阿七总能这样一次次做变色龙。但实际上他改不了，“反正我没错。两厢情愿嘛。小报发行量小，广东小报广东人看，广西小报广西人看，我各寄一稿，两广的人民都看得到。折衷一下理解吧，怎么样？”“反正你是想捞钱啦。”讲到钱，阿七就默认了。

很不幸最近我和阿七发生了金钱纠纷。到现在我还理不清我们俩该由谁来付这笔费用。我从家里归来，下了火车跟着人流走出隧道，见到阿七搭着胳膊斜靠在隧道口的垃圾桶旁。他在接我车——他从未单独送或接过我车的。“我跟你讲”，阿七截住我，带到路边，艰难地咽着口水，“我跟你讲，我很为难，落尽面子了。倘若以后你不再理我，请别对外说是为了钱的事。为了什么都好，就不能说是为了钱的事……若不，你和我，都落尽面子了。”我想了一下。我实是没办法单方面承担这笔款。